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内容提要：

本书讲述的北大人生规划是值得社会各层各界去学习，只要认真阅读，定会从中受益匪浅，以利于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序 言

揭开北大人生规划之谜

高考的学生,往往说七月是黑色的七月,可是他们却在七月里彩虹依旧;生活中,为人处世是一道门槛,有人跨越一辈子都是一个失败,怎么跨就是跨不过去,而他们却能在交际中得心应手,笑对人生;有的人创业一生,留下的是伤痕累累,穷困潦倒,而他们年纪轻轻就已身价百万……

他们是谁呢?北大人。

"噢,是那一伙天才。"

"不"也许他们在我们的心中是那么的过于伟大,事实上,他们又是多么的平凡普通,没有三头六臂,没有高干门弟,奇特天分,他们的天才只是源于他们精炼的人生规划。

本书讲述的北大人生规划是值得社会各层各界去学习,只要认真阅读,定会从中受益匪浅,以利于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第一章 "志高"凌绝顶 ——创建辉煌的事业规划

李惠·北大 98 级新闻系

作者简介：

刘惠,女,北京人,是一位温柔娴静的女孩,爱好文学和写作。

自蔡元培先生的执掌北大以来,"北大人"就开始重视"学以致用",以完成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创造辉煌的事业,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他们把这一伟大的传统精神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我们北大创业成功人士很多,举不枚举,于我个人者来,其基本的规划是先确立目标,再围绕目标不懈进取,搞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把学到的东西灵活运用,同时抓住机遇,努力争取成功,若一旦失败,别气馁,找出并克服阻碍成功的原因。

1. 胸怀大海,志吞天下

——确立永争第一的目标

我们北大哲学系的王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则这样的寓言:

三只青蛙掉进鲜奶桶中。

第一只青蛙说:"这是命。"于是它盘起后腿,一动不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第二只青蛙说:"这桶看来太深了,凭我的跳跃能力,是不可能跳出去了。今天死定了。"于是,它沉入桶底淹死了。

第三只青蛙打量着四周说:"真是不幸!但我的后腿还有劲,我要找到垫脚的东西,跳出这可怕的桶!"

于是,这第三只青蛙一边划一边跳。慢慢地,鲜奶在它的搅拌下变成了奶油块。在奶油块的支撑下,这只青蛙奋力一跃,终于跳出了奶桶。

王老师说:

"正是明确的目标——要找到垫脚的东西,跳出这可怕的桶——救了第三只青蛙的命。"

"年轻人应该有目标——而且目标一定要崇高。一位企业家指出: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只为分数而学习,那么你也许能够得到好分数。但是,如果你为知识而学,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分数和更多的知识;如果你为做生意而努力,那么你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如果你想通过做生意来干一番事业,那么你就有可能不仅赚很多钱,而且会干一番大事;如果你只为薪水而工作,你有可能只能得到一笔很少的收入。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你所在公司的前途而工作,那么你不仅能够得到可观的收入,而且你还能得到自我满足和同事的尊重。你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越大,就意味着你个人所得到的回报就会越多。"其实,北大的每一名同学都知道目标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在高中时,就是因为他们有明确、崇高的目标,才走进北大的。

1996年江西省理科高考第一名王龙说:

要做一件事情,总须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否则这件事情本身在脑中也是模糊的,有时候白花了精力也不知道。只有有了明确的目标,能力才往一处使,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目标要根据对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和心中的理想志向来订,既不可好高骛远,又不可保守。而且,最好把目标订得稍微高一些。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样利于有充分的把握。比如我,我想考上北大或清华,因此把目标订高些,要考个江西省理科第一。没想到目标真的实现了。同样,如果我想考一般本科,便把目标订为重点本科。填报志愿是高中生必须确立的目标之一。有了目标就有了压力,有了压力就有了动力。

1979年,英国有一位79岁的高等教育协会主席约翰·富尔顿爵士来北大访问。当北大领导介绍说北大历年录取新生的分数线均高于其他院校时,客人插嘴说:"我很理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解。你们北大,就如英国牛津、剑桥一样。全国家长,都渴望把他们的子弟,送来读书。全国顶尖学生,也无不以能进入北大为最高理想。因此,你们收来的学生,都是拔尖人才。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拔尖学生,在你校学习四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毕业出去,他们在各行各业中,是否仍是拔尖人才呢?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无可辩驳的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敢为天下先"是我们北大的老传统。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新一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封建积习难返,死气沉沉,师生很多都是候补官僚和八大胡同红灯区的常客。当时,朋友劝他不要北上,因为北大控制在腐败的北洋政府手里。但蔡元培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毅然就职。让北大重获生机,这是一条前途莫测的冒险之路,非大勇者不敢一试。蔡元培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倡导"新思想,新学术",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新风。他同时实行"民主办学",建立了以评议会、教授会为中心的新教育体制,并重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入学;开办夜校,开我国成人教育的先河。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学制与课程的改革,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气魄,融合中外文化,包容各处学说学派,提倡美育与德育,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讨,把北大改造成全国最先进的、培养第一流人才的最高学府,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圣地"。

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显然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以致更深刻地影响着本世纪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

蔡元培在北大期间,不仅学术空气自由浓厚,同时各类社团也繁荣活跃,而且学风良好,秩序井然。师生关系和道德风尚也大大改善,旧北大那种"老爷"作风渐渐失去市场,北大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学生们能自由地吸收新的思想意识,从客观到主观上对新文化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说陈独秀小的时候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近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真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咬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

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高光的时期。而这段时期里面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 1919 年 6 月 11 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 41 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那些“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贾政式的人物。陈独秀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 20 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如果说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那么陈独秀便是赤膊上阵的急先锋。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战斗檄文，摧枯拉朽，令“孔家店”轰然倒塌。

2. 学无止境，不懈进取——向理想迈步

北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永远追求向上、从不言败的精神。博雅塔下的神圣殿堂，汇集的是天才的学子、出色的教师。优秀的人才要有出色的教师来教授、培养，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潜质。价值连城的玉石还要经过巧手玉师的琢磨磨砌，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美丽的神话是创造者的智慧；绚丽的光环下，是我们北大学子孜孜不倦的努力。一代又一代北大优秀的管理者、教师和学子们，铭记着北大的校训，继承和传递着北大昔日的荣耀，奋力创造北大的明天。我们坚信，经过北大人一代代的努力和拼搏，浇筑北大人血汗的北大光辉将与岁月同在！

一个神话的不朽是因为其美丽，是因为创造者的血汗凝聚成的美丽历经千万世而光芒仍在。北大人有一个梦：创造未来、创造一流、创造一个不败的“神话”。我们赞美那些英雄的人们，赞美那些为创造辉煌而不息奋争的人们，北大人是时代的骄子，北大是一道动态的风景线，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在这里酝酿，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又变成了令神话皆惊叹的现实。永远的北大，永远的骄傲！

一个世纪以来，北大精神如一团永恒的火焰，生生不息。几代北大人，在教学与科研接力赛中，薪火相传，使科学、民主、开拓、奉献、爱国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在北大的每一个细胞中，都跳动着不息的北大精魂。北大永远的唯力在于永远年轻，风华正茂。一百年的沧桑使她愈发地展示了生命的强劲，改革的春风又赋予她新的活力，在走向 21 世纪、创造新的辉煌的历程中，北大越发地青春永驻了。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在北大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制作了下面这曲新乐章，歌以咏之。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卓然不凡的北大人对母校的殷殷期望，从跳动的乐符中，又可以读出北大未来的风流！不懈的追求总在奔放的诗篇中释放浓浓的信念，少年北大的英姿将尽情地展现在 21 世纪的巅峰！那无限美丽的天地是勇敢者的风景！《少年北大之歌》，咏出了“北大不败”的豪情壮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北大也决非一无缺点。但她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她也绝不妄自菲薄，迷失自我。因为，她懂得珍视自己的历史，不管是辉煌还是耻辱，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不管是寂寞还是喧闹，处变悠然，宠辱不惊。世易时移，她懂得如何适应发展的时代，扬长避短，以免落伍。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将永远紧跟时代，

永远追求真理,永远信仰自由。

人们熟知和佩服的王志东是第一个写出 Windows 中文平台的程序员。BDWin、中文之星、Richwin 使只正经写过 5 年程序的王志东成为继严援朝之后中国第二代程序员的象征。

1987 年,王志东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完大三,感觉学分挣得差不多了,就进入中关村。通过一年多的锻炼,王志东觉得中关村自己大致了解得差不多了,就进了方正。

1989 年,进方正的王志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方正系统的硬件兼容和软件特殊要求问题。方正对程序源代码控制得非常严格,王志东要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先反编译方正的软件,然后再为方正软件解决兼容性问题。他说:"加密对我不起作用,我能把原来的加密方法改了,然后再用自己的方法给它加上密。"

方正的维思系统决定在 Windows 上开发,但当时 Windows 不能处理中文,找微软,微软还没做 Windows 中文版的计划。王选曾安排过一个学生做 Windows 汉化,做了半年,这个学生去了加拿大。王选想到了王志东:"你能不能把 Windows 汉化了?"

任务很艰巨,要在 3 个月内拿出东西。"Windows 我从来没摸过,再说,我对 C 语言还不是特别熟,我以前多是用汇编和 Debug 一点点改。但我一拍脑袋,就答应下来。我说,行,我试试看。王选说,别试试看,立个军令状。我当时想,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又能怎么样。"就这样,王志东正式到了王选的研究所。

王志东开始躲进自己屋里,什么人都不见,专心写自己的程序,各种设计的纸铺了一地。两个多月后,王志东写出了汉化 Windows 1.0。

直接在西文 Windows 上改,版权上有问题,工作量很大,又不能改得很完整,只能凑合用。王志东突然想到能不能用外挂的方法解决 Windows 处理中文的问题。王志东用了二个多星期的业余时间,把外挂的方法验证了。

此时,王志东兴奋了,"这是全球第一个 Windows 外挂系统。原来写了一万行的程序,外挂方式一千行全解决了。"

后来,这个程序越写越少,而且原来英文 Windows 的所有 API 都能用了,所有的打印机和显示器都支持。1991 年 6 月 6 日,首届全国 Windows 研讨会在福州召开,王志东对单位领导说"我想参加",后来又说"我要参加"。为了参加这个会,王志东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忙活产品化、测试样张、宣传材料,做完以后,王志东给它起了个名:BDWin。

BDWin 拿到会议上,把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震动了,CCDOS 发明人、这次会议的策划人严援朝自己开发了一个中文视窗,叫做保利视窗,但是他一看到王志东的 BDWin,就说:"我的东西不推了,推你的,我的东西不行。"后来,严援朝给王志东做了总工程师。

1991 年 10 月,王志东认为自己在方正该学的都学得差不多了,就想走出方正再学点别的。

离开方正的王志东面临三条路:一是,自己办公司;二是,出国;三是,去外企。这其中,到新加坡做 EDI 和多媒体开发,因为技术比较新颖对王志东吸引力最大。"我想去学一学国外企业管理,学几年,再回来自己干,同时练练英语,利用在家等出国手续的机会,王志东又埋头做了一个全新的中文之星 1.0 版。

不久,他碰到了一个北大同学,同学看到王志东写的这个新玩艺,建议他一起办公

司。”北大的同学在一起特别务虚，说我的软件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面旗帜，我们说起大道理来没完没了，但特别投机。”

出国包吃包住，什么都有，但王志东觉得不刺激，虽然新加坡给的是技术移民名额，并且为王志东签证延期了三次，但王志东此时已经醉心于合伙投资办公司了。

1992年4月底，新天地成立，王志东出任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当时看来，这样的分工很自然，我是搞技术的，公司有管理和技术两摊事，我只能管技术，我不管技术，没有人管技术，我也懒得管财务和人。”

中文之星几乎是一夜成名，在很短几个月时间内一下就传开了。公司当初的定位是：用中文之星出名，不求赢利，以这杆旗帜进行金融、房地产的炒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公司架构。

但世事总是出乎人的预料。1992年底、1993年初，中文之星开始赢利，而房地产没挣到钱。

1993年初，公司开始出现矛盾。到了七八月份，矛盾进一步激化，王志东感觉拖下去，对自己绝对不是好事，“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我不能不要我的自由，而且，我也没有把中文之星这个产品本身太当回事，这个东西好像我做作业似的。”

王志东认为，营造一个好的软件开发环境比创造一个好产品更加困难。”我曾经一厢情愿地想为自己找一个好的环境，使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写程序，但是国内缺的就是这种环境，国内搞技术出身的人倒霉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不值怎么经营，怎么管理，怎么把握方向。”

王志东在找了几次也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环境后，就下决心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辞职以后，王志东找到方正、联想、长城等几家大公司，想说服它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公司开发中文平台，因为王志东觉得它们都需要新的中文平台，但王志东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四通找到了王志东，王志东也看中了四通的体制，四通利方成立，王志东亲任总经理。

从1993年底到1994年3月，王志东领了六七个程序员，没日没夜地做开发，程序量将近100万行。王志东当时认定Richman最快3年左右才能把整个框架做好，它技术的先进性会有5年到10年。这话后来被验证是正确的。

程序源代码被视为程序员的命根子，但王志东正经写程序的5年间三次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源代码。第一次，是在王选教授的研究所，王志东把自己做出的第一个汉化Windows留在了研究所；第二次，是他离开方正的时候，他交出了BDWin的源代码；第三次，是离开新天地的时候，他还是交出中文之星1.0所有源码和所有开发资料，而且还把中文之星2.0的开发框架留下了。王志东每交出一份源代码，都这样劝慰自己：“这个产品只是我的一个习作，我会用新知识，写出一个更好的。”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是因为他明白：技术人员必须自爱，单位的权益一定要尊重。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地创新。王志东特别看不起某些人拿着X年前写的产品，跳来跳去，到哪都是那个东西，一辈子好像只能干一样东西似的。”这样做是对所有参与开发的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要背着一个包袱走以后的路。”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也交出了包袱。在组织原班人马写RichWin的时候，对他的同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伴说：“中文之星的源码，你们要全忘掉。”

很难想象，如果王志东没有这样不断超越自我的魄力，他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只有认识真正的北大精神，方能领会她的不懈进取的活力之源。可是这样一个话题，太难以说清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对“北大精神”的不同理解，又使得她更加神秘和令人向往了。在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颇不以为然，可也并不以为什么：“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其实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可是世人不解：既然北大无派，那一次次学潮又怎么闹得起来呢？答案本就简单：虽然无派，北大并非一盘散沙，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力。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新文化运动使北大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是在生活中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则排斥异己，与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其实“北大精神”，就是一种尊重知识的学术氛围。“自由散漫”又何尝不为新思想火花的迸发创造了生存的环境？这种“氛围”，譬如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中所言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无疑培养了学生独立判断及自找设计的能力；甚至，北大“松散”的气氛却又成为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对于许多人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1944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凶”“松”“空”三部曲》的谈论北大人的妙文。在与清华大学相比较时，有以下论语：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也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独立，故能出特殊人才。

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略高。北大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儒雅博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从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来看，北大正是着眼于尊重个性、强调独立的人才观念；在北大，你可以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你的天性的优点将会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北大不会埋没人才，北大不会压抑人才，这是北大的风格，也是北大赖以发展的动力。人尽其才的环境，又怎能不创造出一流的学府？

历史将把一个世纪抛在脑后，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百年。古老的燕园中，年轻而富于活力的北夫人在忙碌着，睿智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未来，凝聚的焦点是一片灿烂与辉煌。即将告别百年，迈入新世纪的征程，北大，永远的北大在兴奋、在躁动。在爆发，她焦急的神情显示了迫不及待的心理，在未来的舞台上，角逐风浪。百年的风雨洗礼，她益发地英姿勃发了。风华正茂的年龄，风华正茂的中国，风华正茂的北大，一批风华正茂的北夫人在为北大的未来、为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创造21世纪的辉煌。百花争妍、诸子争鸣的学术自由气氛中，研究有素的精髓成果脱颖而出；高水平的学术争鸣中，一批批有独立人格、会独立思考的学子从这里走出，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奉献了一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生的心血。

迈向未来的世纪,告别百年的辉煌,创造世界的一流,北大靠的是人才和资源。这里有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最优异的学子,集中了一批最有思想的专家教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襟气度的感召下,这里是当代中国最活跃的思想阵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学术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让学术和思想得以自由发展。北大要进步,要创造一流的大学,具有独立思想和高深学识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所幸的是,北大不仅有,而且还在继续招引一批又一批的真正人才汇集在北大的旗帜下,向 21 世纪发起了挑战。人才的优势,奠定了北大挑战者的实力基础。下面请看北大创业的典范不懈进取的王君。

王君系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系 96 届本科毕业生。大学毕业以后,他选择了农业作为自己创业的切入点,在这个市场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以下是我采访他的笔录。

问:我进来的时候,留意了一下你的部门设置,要是不涉及商业秘密的话,能否对各司职能作一番介绍?

王君:这倒不存在什么商业秘密。我的这些部门除个别的,大体也就表示了我在所经营的项目。办公室是我的,专家综合办其实是两块,一块是专家中心,实则是一个专家信息网络,这儿汇集了农科院,全国各地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领域的专家信息,有宏观理论型的,也有技术操作型的。中心的工作就是联络,组织这些专家并维系同他们的长久关系,从而为我们的其他项目铺设前提。综合办则是会计财务及内务方面的工作。

会议工作部是我的重点项目部之一,主要是不定期召开一些交流研讨会,可以是政策性的,可以是趋向性的,也可能是实务性的。我的规划是"会议产业化",当然这个产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而是我概念上的自然界定,而我的这些会议是按市场规则通过商业化运作的,它是能够创造利润的,当然也会亏损,但它又有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公民意识的和政策导向的,因而它有很好的形象力。

培训工作是另一个重要项目,目前我组织着三个培训班,养禽、水产、农药方面的都是长期班,平时举办一些短期性及时性的培训班。这些事情都深受各地养殖大户和相关人士的欢迎,所以上课的人很多。

组稿采编部的工作是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供内部交流用,也策划一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方面的选题,然后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参与创作,再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应该说我们的一些书还是颇受农民欢迎的。

图文设计部除了为公司的各项业务设计制作各项材料外,也承揽一些外面的业务,目前有两台苹果、两台 PC、制作人员都是搞工艺美术出身,水平不错。

发行储运部则主要负责图书及有关资料的进、销、存工作。大体的职能分工就是这样,不知是否讲明白了?

问:非常清楚。你的工作路线大概就是:"一个中心,数个基本点。"紧抓住"农"字不放,然后外延拓展。

王君:不是向外延拓展,而是向内涵发掘。我国的农村市场潜力之大,无与伦比,现在还没有开发,里面有许许多多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完。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问：对于农村方面的事，我了解得很少，此前也不太关心。但你是学国民经济管理的，怎么选准了农业这个口呢？

王君：其实我是从城市里出来的，家在江苏南京。不过我有一些亲戚在乡下，小时候也常去那里玩，那个时候肯定是无意识的。但毕竟对农村有一定感觉，起码对它有些感情。考大学时当然也不水曾想过今后在这方面发展。国民经济管理这个专业学的内容颇为庞杂，是涉猎型的和基础性的。到大二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一些关于农村方面的信息。那几年关于乡镇企业的宣传如火如荼。学校有几个协会，是关于农村和乡镇企业方面的。他们搞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图片展，那个图片展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之后我就积极地参与这样一些活动。我听他们组织的有关讲座。记得1994年他们聘请了一位劳模，是西部摘星火科技的。他对中国农村，特别是信息工作的分析对我的启发极大。当时就想毕业后一定要争取去农业部，最好是乡镇企业管理局或者信息分析中心。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的涉猎自然就有了偏好。大三的时候，学校农经系搞了一个有奖征文，我提送了一份报告，题目叫《关于高效农业的几点建议》结果获了个一等奖，还被选人农经系组织的课题调查组，先后去了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还有几个内地较为落后的乡村，感触很大。吴仁宝和史来贺带出的是企业型农村，以工补农，但仍以农为本。但还有一些地方的调查对我的影响更大。那些乡村出了不少养殖种植大户，但大都属于摸索创业型。他们的信息通道非常闭塞，技术力量薄弱，市场拓展也不畅通，但他们发展还不错，产供销虽不完善，自产自销还不错，不过也只能是小富而已。而他们对相关知识的渴求，特别是对专家们的热烈欢迎和依靠让我感觉到农民知识意识正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而这里面的文章实在是太大。

另一重要的事就是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认识了几位农科院专家，他们对我也比较欣赏，觉得这个小伙子比较善于思考，比较稳重，对师长也比较尊敬。此后，我就常去农科院找几位老师。他们很希望我能读农科院研究生。我也有过想法，但上研终究没有列入我的计划，我还是愿意去农业部工作。

大四一开学，我跟着农科院一位老师去参加了一个会议，叫“高效农业研讨会。”那位老师是受邀请的主讲人之一。他给我介绍了研讨会的主办者，农科院研究生毕业，某公司的老板。一度交谈之后，他对我很感兴趣。之后，经常去他公司，了解了这里面的不少商业知识。我给他搞了几个文案应该说都很有气势，又帮他请过一些学校的和农科院的专家学者，也请过一些政府官员。这样，我帮他（当然也能得到不少报酬）的同时，自己的眼界和关系网络得以迅速扩大，更重要的是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主要是看到这里面不仅能给农村朋友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还能有很好的利润空间。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了一些项目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划性的思路，那时我想与那个朋友一起做，因为作为我个人来讲，对项目尽管有信心，但对自己的操作能力却信心不足。

但所谓日久见人心，在组织另外一个会议时，那个朋友居然采取了坑骗的伎俩。当时我极力反对，但他不听，后来出了点事，他也搬离了农科院，至今也未通过

气。

那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一时间我有些气馁,这时候刘教授,就是我认识的农科院的专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看出我不是块上研上博做学问的料,但他认为"实践出真知",并且认为农科院有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却没有很好的组织者,所以知识和技术利用率都很低,从而导致资源浪费。而且他告诉我:"青年是最富有朝气和创造力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所以他鼓励我自己出来挑担子。失败了不怕,因为年轻,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应该说,刘老师帮我最终下定了决心,所以毕业前,我就着手准备,再未去其他什么地方找过工作。所幸这两年的发展,逐渐有了一些眉目。

问:这两年的发展,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有过挫折吗?

王君:最大的感受就是找准了点,抓住了市场,这个太重要了。可以说这两年的发展一帆风顺,谈不上什么挫折,一切接着我的思路下去,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年我营业额30万元,1997年是100万元,今年预计是500万元,而且市场越做越宽,几个基础性的项目都已发挥出了强劲的潜力。比如我的轮训班,一周一期,每期都能达到近百人,由此影响也不断扩大,我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

农科院是我背靠的大树,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作为我国农业方面的学术和技术权威,其知识资源极为丰富,不管是知识存量还是增量,都有着强劲的爆发力。关键是怎么去利用这些资源。我的专家中心为我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农科院的这批专家学者要么是学术权威,要么是技术权威,但他们中间有相当一批人处于被闲置的边缘,由于他们的知识被闲置,他们自己也被闲置,其实这些老师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创造力也特别旺盛,但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农村的广阔舞台隔离开了。这里原因很多,体制上的、机制上的、渠道上的、组织上的等等。其实他们渴望工作在属于他们的真正舞台上,那就是农村,就是农民。

我就试图来帮他们实现这一切,我用我的思路,我的激情,我的资金把他们自愿地结合起来,去为广大农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农民兄弟对农科院、对农业问题专家都是极为信赖和依重的。

问: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目前应该说我国农民的收入还是比较低的,他们怎么来支撑你的这个500万呢?

王君:这个帐我不可能跟你细说。我跟你讲两点:一是中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9亿人的市场。二是中国农村已经有相当一批人先富起来了,还有更大一批人在致富道路上跋涉。仅就我的数据库而言,光全国的养殖大户就有3万家,而这个数目仅仅是九牛一毛。当然,总体来说,农民兄弟的钱还是不多的。所以我就不能采用任何的坑蒙骗手法。我只有公开,透明,我把我的回报计算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是否是"物有所值"?这是"阳光下的利润"。我有一个感受:"相当一批农民兄弟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知识的价值,并愿意为它投资,尽管他们很少人在用"投资"和"预期"这些词。而这些知识必须是切合实效的,就是搬出来能让他们实际用上的,这些知识在他们的心里才是真正的"知识",他们根本不务虚;务虚的是那些政府官员,所以我们也组织一些政策性的形势会议,收效也不错。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上个月开始,我们组织的"全国三高农业专家巡讲团"项目也启动了,其目的就是与各县农业主管部门联合,让专家们走下去,这样既能结合当地情况,又能为农民兄弟们省去不少差旅费用。第一站在江苏盐城,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还有重要的一块就是与相关企业的合作。比如农用制剂、农用机械、农产品加工等诸多企业,我们为他们提供信息网络,提供展示场所,提供技术支持,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把这些企业跟他们的用户直接联系起来。这些工作都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源。

问:这个产业的前景这么广阔,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介入进来,我是指大学生群体?

王君:从长远来看应该会这样,而且也应该要这样,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介入,这些人不单纯是技术型的,他们将更多的是一些经营型的复合人才,这样我们的农业产业才能取得一个较快的发展。不过从当前来看,许多大学生观念仍受着很大的束缚,放不开。比如要进个大城市,弄一个大城市户口,找个稳定可靠且高薪的工作。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方面了。甚至考研也是为了这些。所以说大学生创业尚是发轫时期,很微弱,而又要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恐怕就少之又少了。

不过大形势很好。国家对这个问题始终最关注,从十五大报告到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这个问题的根本性意义日益显著,社会各界的舆论工作也大踏步开展,这些影响都将是非常深远的,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把这些行业一个个地做起来,成长起一批企业家来,再让这些推动中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所谓的"企业家型经济"吧!

问:看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也是蕴含着无限商机,它的根本性发展也需要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推动。你谈的这些内容使我很受启发,我也真心祝愿你的事业如日中天,做出更多有意义的事来。最后我想请你谈一谈你的生活方面的情况,不知是否可以?

王君:我的生活很简单,在现代城认购了一套 144 平方米的房子,首付 11 万,月付 9000 余元,这里也有一个理财方式,我首付后不入住,将房子出租,月租大约一万五、六,用此支付月付,这样我很轻松地获得了这所豪华气派的房子,也就留着结婚用吧。现在我租一个三居,每年把父母接过来住半年到处转一转,活动活动筋骨,养养身体。至于我个人,倒是有一些爱好,比如旅游啊,就是没有时间,最好的享受就是看看书,看看大片什么的。生活过得简单,也很充实。

3. 提高综合素质完善自我

我们北大人的"狂"是历来有名的。即使到了现在,仍有不少人说北大的学生"狂"。

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现为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虹海先生说:

"北大作为中国文科最高学府,应该为社会输送大量优秀官员,从而为中国当今的改革与发展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在日本研修时,当日本人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学生时,常常肃然起敬地说:北大吗?那就相当于日本的东大(东京大学,日本国立大学中的第一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块金字招牌)了!其实大有不同:东大是真正的官僚制作机器——一有时,一届政府中半数以上的阁僚是东大出身,而现今的北大都已被人德称为关外一块不毛之地了。看来一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北大若是真狂,应该将自己和世界一流的学府放在一起比较。但真要这么比较的话,恐怕不少方面就不一定能狂了。不过,这也是好事。北大也只有这么比,才能知耻近乎勇,知不足而自反也。”

刘文典最早进入北大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不过,他是刘师培的弟子,主张旧学,和老师同在国文门任教授。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

说他“才高”,是因为他的古文学修养十分深厚,尤以中古文学和庄学独步海内,有两个人看法可为佐证。一是章太炎。章氏上承清代朴学,下启现代学术,是名重一时的大师,素不轻许他人学问,惟于刘文典,则十分惜重。二是陈寅海。陈氏身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独赞刘文典之庄学:“能明白地表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可贵。”刘文典的文章之学,在清末国学大师中自成一家。更为可贵的是,刘文典留学日本之时,自修而通英、日、法、意四国文字!

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学生回忆当年在红楼进进出出的刘文典:“叔雅(刘氏字叔雅)先生,相貌清瘦,身躯飘飘,有弱不禁风相。头发胡须,经常留得很长,又不爱洗涂修整。真是首如飞蓬,面似黄蜡,……但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20年代中期,他到安徽大学当校长,不久之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时蒋介石大权在握,志得意满。但安徽大学却正间学潮。于是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询问情况。刘文典在接待室一见蒋介石,就指手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当场把蒋介石吓了一跳,接着刘文典反客为主,数落蒋的不是,最后得出结论,学潮是社会动荡激起,而社会动荡正是由军阀混战引发,所以此责任应由蒋介石来负,蒋介石哭笑不得,把刘氏押人看管所收审。幸亏章太炎、吴雅晖说情才得以脱身,但被免安大校长之职,派往清华任教授去了。刘文典获释后,赴上海感谢章太炎相救之恩,和章氏二人说起此事,章问:“听说你当面骂了他一顿,可是当真?”刘还气愤未平,比划着说:“我用的是京戏中击鼓骂曹的姿势。”

联大有一次开教授会议,朱自清提议某人应晋级教授,刘文典大为光火:“如某人当教授,你请我到哪里去?置陈寅老于何地?必先请当局给我两个设法,谋一条出路,然后方可语此!”一时传为笑谈。但刘文典不肯善罢,常对人说:“吾清华文科,实只两个半教授——寅恪一个,友兰一个,我半个也。”(其实,刘文典只对大人物傲慢,对学生和友人则十分礼貌谦虚,显示出他性情敦厚的一面。无论学生朋友,见面先自行停步,如日本人一样,作九十度鞠躬。他说话是安徽江北口音,声音很细,但学生仍爱听他的课,原因是他讲课不仅渊博深厚,而且妙趣横生)。

对于北大人这种“狂”,欣赏者有之,低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是对之不满。特别是后现代的今天,人们倾向于抹平一切质的差异,对特立独行的“精英”总是要嘲笑与贬抑之而后快。王朔之辈在创作之初就宣称,他们要力图打破知识分子在道德领域对他们形成的压抑感,要摧毁那无所不在的文化霸权。其实,后现代的健将们是误解了,一方面知识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适应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变化,冥顽不灵而抱残守缺,看不起下层群众,而以所谓"高雅人"自居,以北大的牌子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们一无所能而又不屑用功,一到具体事上便表现出其"绣花枕头"的本性,这是一些沾染了北大流弊,却未抓住北大精神本质的人,这是北大人可能有的毛病;而真正的北大人都是首先对自己真正反思,痛下针砭的。

在人们习惯性的联想中,大学生聪明而博学,是知道得很多的人。不少大学生的表现也确实能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他们能说会道,侃侃而谈,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特别是一些名牌高校的学生见多识广,下自平民百姓,上至总统部长,他们都领教过。大学里的各类讲座有的是,只要愿意,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到。学界的、政界的、商界的各类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上台"献艺",传播着各种信息和知识。不少学生反映说,听讲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获得较多的知识,对于开阔视野很有好处,这是坐在图书馆里自己看书所不能比拟的。一些经常光顾各种讲座的学生很快就会被各种知识武装起来,变得无所不知。他们可以得意洋洋地将这些新鲜出炉的东西拿出去卖,自信心也大增,仿佛经过若干次洗耳恭听,已经融会了各家所长,将十八般武艺都学到了家,成为了万事通。遇到新朋故友,便可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让新朋惊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让故友感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过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出租车司机式的傅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者多,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少。是一种浮在表面的知识,而没有在内心扎下根,也就是说没有内化到灵魂的深处,没有变成"文化"。这种知识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只是知识的旁观者,而不是拥有者。他们在担当着知识的廉价的贩运者的角色,却自以为是人类思想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他们所贩卖的东西是扭曲的、变了形的,经不起推敲的。他们的海侃神聊只是出于刚出道时的兴奋、新鲜和胆大。他们尚不了解知识之途的艰辛,由于对学问只是触到了一点皮毛,因而也缺乏敬畏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胆大妄为"不仅不是什么学问,而且是对学问的糟蹋。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是不敢谈的,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但是对学术有所钻研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知道得愈多,愈觉得自己无知;钻研得愈深,愈觉得自己浅薄。我曾在某著名高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大学生无所不知,硕士生一知半解,博士生一无所知。我猜想,这大概讲的就是学问与胆量的关系。

90年代的北大学子开展了有声有色、有落实有效应的"文明修身工程",提出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从小事做起"、"向劳动人民学习"等口号。

真正的北大人 在市场经济中有他们活泼的风姿。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口才好、善交际的北大人 在各行各业都不居人之后。有纵横排闼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家,有认真负责、办事能力强的国家公务员,有大公司经理,有电脑专家,有技术骨干,有著名的编辑、记者、作家,更有讲台上为人师表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北大人狂,有我狂的资本。更因为在各行各业职业外表之下,真正的北大人虔诚地维护着我们自北大母体吸收和传承的神圣的精神价值。我们心怀天下,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更真实。更善良、更美好而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自由、民主、美善、和谐、正义,生命因之而尊贵,这才是我们狂者的根基与本色。

4. 学以致用,向抱负进军

我们北大具有许多光荣传统。自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起,我们就开始重视"学以致

北大学子的人生规划

用”。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学以致用”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蔡元培是一个老教育家,了解中外教育制度,而且主持过全国的教育工作。可以说他是五四时期中国极少数具有系统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教育家。尤其是对大学教育,从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体制,都有一整套的设想,他也是怀着这一整套设想去改革北大的。因而他一到任就能大刀阔斧,将改革全面铺开,他取消了工商两科,将用于两科的经费、设备和校舍用于扩充理科,北大成了文、理、法三科并存而以文理两科为主的大学。这样,文科又是北大强中之强的学科了。北大是当时国内高校最早一个成立研究所的大学,具有开创意义。

在这方面,北大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文革中,北京大学曾出现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分化。50年代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分流了较大部分北大理论教育的师资,使北大文理科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力量受到了削弱,更为严重的是北大固守着传统的包袱,在新时代面前又显得力不从心。自然科学研究既受到政治的影响,又没有从实践中去寻找它生命力的根基;社会科学只不过在政治的需要中,在一个个革命术语和一段段语录中来回打转,也没有在社会实践中找到与之相连的切入点。这段时间的北大仍在为教学而教学,为政治而教学。由于应用研究理论没有得到及时发展,反过来也阻碍着基础理论的进步,而后陷入一种迷茫的反复和空荡。

北京大学作为当时科研力量最强的大学,少有成果、少有杰出人才的跃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却是首当其冲的。例如华罗庚教授,他在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形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估计,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写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但是到解放后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六届